

儒释道文化丛书

中国历代 大儒

主编
副主编

舒大刚
杨士文



儒释道文化丛书

中国历代 大儒

主编 舒大刚
副主编 杨士文

B222.05/



0311564

K05
du

(吉)新登字 02 号

儒释道文化丛书
中国历代大儒

舒大刚 主编

责任编辑:任毅馥 封面设计:王劲涛

出版:吉林教育出版社 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31.75印张 2插页 744 000字
1997年6月第1版 1997年12月第2次印刷
发行:吉林教育出版社 印数:1—2 000册 定价:60.00元(精装)
印刷:四川省印协印刷厂 ISBN 7-5383-3203-0/G·2863

儒释道文化丛书

顾问 全景芳 方立天 任继愈

主编 舒大刚

编委 (按姓氏笔画为序)

田海平	刘伟航	邱高兴	邱进之	李刚兴	张 力
张希峰	杨世文	杨光文	周 斌	何尊沛	祝尚书
陶思炎	陶慧琳	唐代剑	康学伟	黄 浩	黄海德
黄修明	舒大刚	廖名春	蔡东洲		

中国历代大儒

主 编 舒大刚

副主编 杨世文

撰稿人 (按姓氏笔画为序)

邱进之 李 健 李刚兴 何尊沛

杨 超 杨全昌 杨世文 汪受宽

赵载光 常金仓 康学伟 舒大刚

廖名春

前 言

儒学是中国文化的主体，儒家文化基本上成了中国文化的代名词。本书是中国历代大儒评传，读者于此可见历代大儒的生平业绩、生活风采和学术特色，也可略知中国儒学发生、发展及其演变的历史。

一、儒学的流变

中国儒学，是在孔子学说基础上不断发展演变形成的。儒学发展史大致可分为六个时期，即先秦儒家、两汉经学、魏晋玄学、宋明理学、清代朴学和现代新儒学。

先秦儒家诞生于春秋末年，为孔子所创立。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，又是我国第一个职业教育家，他一生教学，有弟子三千，贤者七十有二。又删订《诗》、《书》，修起《礼》、《乐》，赞《易》，修《春秋》，制定了儒家经典。他还精研覃思，形成“仁义礼”一体论、仁政德治论和“君子”道德论，为儒家学派奠定了理论基础。从此，作为有经典、有纲领、有徒众的儒家学派正式问世了。孔子创立儒家，其意义不仅仅在于一个学派的诞生，而且由于儒家讲学之风的影响，促成了诸子争鸣的形成和百家的诞生，带来了中国学术繁荣的第一个高潮。战国是儒学壮大期。此时儒家得

到初步发展，成为势力强大的一世“显学”。《史记》说：“自孔子卒后，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，大者为师傅卿相，小者友教士大夫，或隐而不见。”（《儒林列传》）在诸子百家竞相争鸣的学术风气下，儒家作为一个“游文于六艺之中，留意于仁义之际，祖述尧舜，宪章文武，宗师仲尼”（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）的显赫学派，在列国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，与风靡一时的墨学并为当时的两个“显学”。但这时儒家内部也产生了分化，韩非说：“孔墨之后，儒分为八。”有“子张氏之儒”、“漆雕氏之儒”、“子思氏之儒”、“颜氏之儒”、“仲良氏之儒”、“乐正氏之儒”、“孟氏之儒”和“孙氏之儒”。班固说：“仲尼没而微言绝，七十子丧而大义乖。”即指此而言。儒家八派的流传宗旨多不可详，唯子思、孟氏、孙氏三家略可称说。子思即孔子之孙孔伋，孟氏即孟轲，孟子学于子思之门人，为“思孟学派”，传孔子“仁义”之学。孙氏即荀子，远绍子夏之绪，传孔子“礼乐”之学。孟、荀崛起于战国时期，辟杨墨、攻异端，捍卫了儒学的显学地位，也扩大了儒学的影响。孟子和荀子是先秦时期儒家著名代表人物。

两汉儒学，趋于独尊，也是儒学蜕变，成为御用学术的开端。秦统一中国，儒家以不合时宜、是古非今惨遭“坑焚”之祸，由显学堕入低谷。汉弛挟书之禁，经出崖壁，大儒间出，伏生、田何、辕固、韩婴、胡毋生之伦，竞相设帷执讲，传经授学。但汉初休养生息，崇尚黄老“无为”之治，儒学不绝若缕。汉武龙兴，仲舒对策，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，兴学校之官，建博士之职，儒学迎来了希望的春天，成为指导中国政治、思想、风俗的经典学问，形成影响深远的经学。在汉代，以儒学造就人才，士子进身，官吏升举，多取经明行修、儒理精深之士，于是父敦其子、妇劝其夫，莫不以进学业儒为事，儒学史上开始了第一个辉煌灿烂的极盛时期。另一方面，儒学在两汉又出现了变异和分化，汉代儒

学的变异主要表现在以董仲舒为首的经学家引阴阳五行以解儒学，西汉末盛行谶纬迷信思潮，弄出许多“非常异议可怪之论”，使这一治学风格达到极点。由儒学的异化而有经学的分化，这种分化主要表现在西汉今文经学和东汉古文经学的分野。今古文问题，最初只以经本文字的“今”（汉隶）“古”（战国古文）而得名，但一经对立，互相立异，各缮营垒，因而先从文字分歧，进而在治学风格、思想内容乃至经篇的有无残全上，都形成不可调和的矛盾。从经本上看，今文以齐、鲁、韩三家《诗》、今文《尚书》、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、今《易》、《春秋公羊传》、《谷梁传》为经典；古文家以毛《诗》、《古文尚书》、《周礼》、《逸礼》、古《易》、《春秋左氏传》为经典。在相同的经典中，古文经比今文经内容齐全，文字可靠。在思想内容上，今文家以《王制》、《公羊传》为依据，所讲制度规模比较狭小；而古文家以《周礼》、《左传》为依据，制度弘大，内容丰富。从治学风格看，今文家力图发现五经中的“微言大义”，牵强比附，甚至与谶纬迷信相结合；古文家则重视经文本义训诂，名物考实，以质实纯正见长。今文经学盛行于西汉时期，它的代表人物是董仲舒。董仲舒自“《公羊》学”而入五经，特别善于发挥“微言大义”。他又把儒学与阴阳、五行、名、法、方术结合起来，改造成适合西汉大一统形势和积极有为政治需要的学术，因而获得西汉统治者的特别赏识。也是他向汉武帝建议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，从而确立了儒学在中国思想界的统治地位。古文经学以西汉末年的刘歆开先河。汉成帝时期，刘歆校书中秘，发现大批古文经书，请求设立学官，广其流传。今文博士深辟固拒，刘歆移书让之，斥其“抱残守缺”，“是末师而非往古”，于是激起今古文之争。从此，今古学家各执一端，互相排斥，形同水火。王莽曾立古文博士，旋因败灭而罢休。东汉时期，朝廷虽然只设今文博士，但治古文经学者实繁有徒，大师辈出。贾

逵、马融、许慎、郑玄，各领风骚。特别是郑玄，他遍注群经，杂糅今古，从而以兼容并蓄的姿态息歇了今古文之争，时称“郑学”。

魏晋玄学，儒学向异教蜕变。汉末的郑学，总结两汉经学之功有余，而开辟新视野不足。郑注三《礼》，融会今古，平实雅正；所注《周易》，拾取今文象数之绪余，大谈爻辰，陷于机祥，圣人义理尽失，读者味若嚼蜡。于是，聪明睿智之士转而寻求理论的思辨，魏晋玄学便应运而生了。玄学以《易》、《老》、《庄》为谈资，号称“三玄”。他们毁弃名教，轻薄礼法，对传统道德、经学，实为一大解脱。但援释道“虚”“无”以释儒典，窃渺虚空，玄之又玄，大异儒家“修齐治平”之旨。随着南北朝政治对立的形成，儒学又分为“南学”、“北学”。南学宗王弼注《易》、何晏注《论语》，崇尚玄学，简洁而得其精华；北学守郑玄经注，质定名物，繁芜以穷其枝叶。

隋唐一统，儒学也复归统一。陈隋之际，陆德明综合南北训诂，著《经典释文》；唐贞观年间，孔颖达、贾公彦等奉诏修纂《五经正义》，广采博稽，南学（玄学）北学（汉经学），熔为一炉。此后数百年间，士子为学，官府铨选，一是皆以《正义》为准，儒学在统一的范式中，行使其塑造中国文化的职能。传统“汉学”的种种分歧和争端，也在这里作了总结。

宋明理学是儒学又一变种，统治中国意识形态的时间最长。理学开端，可追溯于唐中叶。其时“三教并重”，儒、释、道竞相扩展势力，逐渐形成合一趋势。韩愈从维护儒学道统出发，倡为“性命”、“道统”之传。柳宗元则倡为儒释互补之说。宋承中晚唐革新儒学的潮流，以兴儒学、卫道统相标榜，反佛、老而熔佛老，建立了遗落训诂、专言义理的新儒学——理学。理学由周敦颐、张载、邵雍开其端，程颢、程颐扬其波，而以朱熹集大成。降及元

明，至于明清，皆以理学为最高的言论行为准则，理学统治中国达三四百年之久。其中虽然有洛、闽（主“义理”）与永嘉（主“功利”）之争，程（颐）、朱（熹）与陆（九渊）、王（阳明）之别，但总不出“心、性、气、理”、“格物”、“致知”的范畴。这一时期，一些理学家忘却了孔子忧时济世的传统，究心于“天理”、“人欲”之际，特别是王学末流，陷入狂禅之弊，对经济治理，茫若烟雾。穷理尽性，以理杀人。儒学迂阔之弊，于此为极。

清代朴学，是对理学空谈误国的反动，也是中国儒学自身发展史上否定之否定的结果。清初学者以“复古”求解放，家道许（慎）、郑（玄），世薄程、朱，以经世致用相标榜，以汉学相号召，以切实为职志。顾（炎武）、黄（宗羲）、颜（元）、王（夫之），并以求实、切理见称于时。但随着民族高压政策的实施和文字狱的兴起，家有智慧，发而为考据辨章、音韵训诂，形成了以名物训诂为特色的“朴学”风格。朴学盛于乾隆、嘉庆，故又称“乾嘉学派”。内中又有吴派（主“博古好古”）、皖派（主“实是求是”）竞相争雄，惠栋、戴震，各领风骚。研经究典，斐然成章。但是清代朴学总体特征是重名物而轻义理，为学术而忽实用，虽整理文献有馀，而经世先王之志，亦已衰矣！于是庄（存与）刘（逢禄）倡言于前，龚（自珍）魏（源）响应于后，肆言《春秋公羊》，阐明“微言大义”，积极入世，企图重致太平，是为“常州学派”。清代朴学乃东汉古文经学的翻版，是清代思想学术的主流；至于以西汉今文经学为法的“常州学派”，究属支流。

降及近代，列强侵逼，在工业文明大潮冲击下，儒学这道带着农业社会泥土芳香的“万仞宫墙”，土崩瓦解了。面对帝国主义的经济掠夺和文化侵略，不甘亡国、亡教、灭种的爱国志士，重张汉帜，再兴儒学。廖平、康有为又祭起“《公羊》学”的亡灵，唱起“兴三统、张三世”的老调，企图重振中华雄风，复庚子国

耻的“九世之仇”。廖、康二人甚至以“主教”自居，欲组建无所不包、无所不有的“孔教”思想体系，以应付变幻莫测的时代风云，但削足难以适履，古老的儒学自然难以容纳新式学问，杂糅而成的“孔教”哲学也无法叩开近代社会的大门。廖平屡变其学也难自适的事实，本身就意味着传统儒学应该寿终正寝，退出历史舞台了。

现代新儒学，是在西学东渐形势下，吸收现代思想资料重建的儒学新流派。“五四”运动“打倒孔家店”，彻底结束了“儒学独尊”的历史。提倡民主，追求科学。但是偏激士子，糠秕传统，肆言西化，民族虚无，充斥寰宇。不甘失落的中国学者，如梁漱溟、冯友兰、熊十力等人，以新思维、新方法、新理论，对传统儒学，重加梳理，再作解人，使之注入新的灵魂，焕发新的活力，形成了以弘扬儒学、复兴本土文化为职志的现代新儒家学派。新儒家苦心经营，瀛海内外，呼号奔走，对东亚儒家文化圈意识的形成，与有力焉。他们断言，以儒学为特色的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的理想模式，人类文明的出路，端在于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复苏。日本的成功，亚洲四小龙的崛起，为他们的断言提供了佐证。

儒学六期分法，主要是依传统的时代分段法，若就治学风格言，不外乎“义理”、“考据”二派而已。汉代今文家、魏晋玄学家、宋明理学家，和清朝后期的常州学派、现代新儒家，即“经学义理派”；而汉代古文家、北朝北学诸儒、隋唐义疏之学和清代朴学家，俱为“经学考据派”。义理、考据二派既互相对立，又互相济补。若发明义理至于空疏，则有考据学家起而为之考事论实；倘考据训诂至于琐碎，则有义理学家为之提纲挈领，疏通大义。因此在儒学史上，今文学空疏苛繁而有古文；古文破碎大道而有玄学；玄学虚空而有北学与之抗衡；唐人义疏穷尽枝叶，故有宋明理学勃然兴盛；理学至于束书不观，故朴学力主无征不信；朴学

究心于训诂而忘经世先王之志，于是常州学派经世、新儒家救世之说大行于天下。义理、考据二派角力争先，互有胜负，各有千秋。其间落后与陈腐自不可免，但就其积极意义言之，义理在救世，考据在求实。将二者结合起来，在求实基础上救世，以救世为目的而求实，就是今天中国人急待解决的学问。

二、儒家的经典

儒家经典，历史上有所谓“六经”、“五经”、“十三经”和“四书五经”之名。这反映着儒学风格不断演变、内容不断充实扩展的历程。

1. 从六艺、五经到十三经

六经起源于上古“六艺”教育。《周礼·地官·大司徒》曰：“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。一曰六德：知仁圣义忠和；一曰六行：孝友睦姻任恤；一曰六艺：礼乐射御书数。”“六德”为思想教育，“六行”为品行教育，“六艺”为才能教育，概言之则为“德行道艺”。孔子向弟子进行六艺教育，于是论次《诗》《书》，修起《礼》《乐》，赞《易》，修《春秋》，形成六经。《庄子·天运》曰：“（孔）丘治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六经以为文。”即指此而言。六艺是六种知识技能，六经是孔子从事六艺教育的教材，六经亦称“六艺”。故贾谊《新书·六术》曰：“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六者之术，谓之六艺。”今《六经》缺《乐》，今文家以为《乐》本无经，附《诗》而行；古文家以为《乐经》亡于秦火，六经只有其五，故又称“五经”。汉武帝置儒学博士，以“五经”为称，原因即在于此。此外，礼分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三书，是为“三《礼》”；《春秋》有《公羊》、《谷梁》、《左传》三书，是为“三传”。此外还有《论

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孝经》、《尔雅》。由于历代尊经尊传不一，遂有“七经”、“九经”、“十三经”之名。大致说来，后汉始有“七经”之称，约以五经加《周礼》、《礼记》（或以五经加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）。初唐有“九经”之名，约以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诗》、三《礼》、《春秋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（或以为有《公羊》、《谷梁》，无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）。唐文宗开成年间（836—840）刻石经，以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诗》、三《礼》、三《传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、《尔雅》为十二经；至宋儒增入《孟子》，遂有“十三经”之名。宋儒又从《礼记》中分析出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，与《论语》《孟子》并为“四书”，作为修身养性之初阶，与前五经相配，故有“四书五经”之称。历代儒学之士研究十三经，阐说发挥，有注有疏，汗牛充栋。唐代有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记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左传》“五经正义”及《公羊》、《谷梁》、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四疏；宋代补撰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尔雅》四经正义。形成遍注遍疏群经的大型丛书，清代将其合刻在一起，即《十三经注疏》。

2. 五经概说

儒家经典，与宗教圣经讲述神功异迹、清规戒律不一样，是关于先民实事的记录，是为人之道和处世之方的教科书。《史记·滑稽列传》引孔子曰：“六艺于治一也：《礼》以节人，《乐》以发和，《书》以道事，《诗》以达意，《易》以神化，《春秋》以道义。”《庄子·天下篇》：“《诗》以道志，《书》以道事，《礼》以道行，《乐》以道和，《易》以道阴阳，《春秋》以道名分。”此外，荀子、董仲舒、司马迁等人都有类似的阐述。概言之，《诗》是用以表情达意，抒发内心情感；《书》叙述先王政事，具有历史经验；《礼》记载行为规范，节制人的言谈举止；《乐》煊染和乐之情，激发人类好善之心；《易》阐发阴阳运行，以明变化之理；《春秋》反映等级名份，实为礼义之大防。六经从不同方面，不同角度，共

同完成对儒家理想人格的培养和塑造，缺一不可，故孔子曰“六艺于治一也”；董仲舒亦曰：“六学皆大，而各有所长。”（《春秋繁露·玉杯》）

诗 又称《诗经》，为篇三百有五，故称“《诗》三百”。是孔子选编的古代诗歌总集。儒家认为，《诗》发于性情，内有哀乐之心，则外发于声音言辞，声成为文字就是诗，音合于韵律就是歌。诗歌就是人们感情的流露，故《尚书·尧典》曰：“诗言志，歌咏言。”歌者也许纯粹是感情的流露，但闻之者则可以知民间的喜怒哀乐，观为政之得失，此所谓“言之者无罪，闻之者足以戒”。故古代有采诗制度，设行人之官，孟春之月振木铎于路，采集诗歌。回朝献于大师，大师协比音律，奏于天子。王者即从献诗中观知民心政风。《礼记·王制》曰：“王者巡守，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。”即此之谓。另一方面，卿士大夫在外交、雅集之时，也常常用诗来表情达意，这在《春秋》时更是一代文雅风气，故《论语》说：“不学《诗》无以言。”孔子曰：“《诗》可以兴，可以观，可以群，可以怨。”兴、观、群、怨就是古人借《诗》言志的委婉作法。相传古诗三千余篇，是“孔子去其复重，取可施于礼义者”，上采《商颂》，下尽周室，共“三百五篇”（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），制为定本。这就是《诗经》的起源和积集过程。六经中，《诗经》是孔子最早整理的一部经典，《史记》载孔子“以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教，弟子盖三千焉”，《诗》排在四经之首。自兹而后，《诗经》传授不绝，形成了气势颇大的《诗》学。

在儒学传授过程中，关于《诗经》有所谓“六义”、“四始”、“二南”、“正变”等《诗》学义例问题。六义，《周礼·大师》又称“六诗”，即“风、雅、颂，赋、比、兴”。六诗各有寓意，故经学家又称为“六义”（《毛诗序》）。孔颖达说“风、雅、颂”是“诗篇之异体”；“赋、比、兴”是“诗文之异辞”。风分十五，《周

南》、《召南》为其首，各系一国之事，为侯国诗章。雅分大、小，系天下之事，为王政之诗。颂分商、周、鲁，美盛德之形容，为歌功颂德之篇。赋者铺也，铺陈言辞，直叙其事。比者喻也，歌他事以喻此事。兴者起也，先言他物以引出正题也。前三者讲诗篇的体类，后三者讲诗歌表现手法；前者属文体学，后者属文章学。“四始”指《诗经》四种体类的首篇，即《史记》所谓“《关雎》之乱以为《风》始，《鹿鸣》为《小雅》始，《文王》为《大雅》始，《清庙》为《颂》始”。记住始篇，以免篇简错乱，此四始本意，后世关于“四始”阴阳五行化的说解都不可信。“二南”即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，为十五国风之一，二南问题古来纠葛最多，都为臆说，金景芳先生解“南”为任，周南即从周公所主之国（“自陕而东”）选出的诗篇，召南即从召公所主之国（“自陕而西”）选出的诗篇。“正变”：内容纯正，可为师法的诗为正诗；内容有怨刺，值得引以为戒者为变诗。《诗经》自孔子删定之后，儒者口诵心记，世代相传不绝，秦始皇焚烧诗书，《诗》即因深藏于人们记忆而不绝。汉兴，传《诗》有三家：齐、鲁、韩，立于学官，都是今文。鲁国申公（培）所传，是为“鲁诗”；齐人轅固生所传为“齐诗”；燕人韩婴所传为“韩诗”。又有诗古文：相传孔子授诗子夏，子夏作《诗序》，四传至河间大毛公，作《毛诗诂训传》，授小毛公，为河间献王博士，号为“毛诗”。今文诗倡以“四始五际”之说，颇陷于机祥。《毛诗》重名物训诂，质实雅正，大重于时。郑玄为《毛诗传笺》，三家遂废。其后齐诗亡于曹魏，鲁诗亡于西晋，韩诗存而无传，后之学者唯毛诗是依，唐《诗经正义》即取毛传郑笺，以为定式。

书 又名《尚书》。是古代档案资料选编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：“《书》者，古之号令。”即指此。相传古者《书》三千余篇，孔子删焉，上断自尧，下迄于秦，凡百篇。又作《书序》揭示作者

之意，排安先后次序，这就是《尚书》。《书》有六体：典、谟、训、诰、誓、命，皆远古帝王不同场合、不同时期使用的文献名称。汉以来盛行“古之王者世有史官，左史记言，右史记事，言为《尚书》，事为《春秋》”的说法，实为谬说，《尧典》、《禹贡》、《洪范》等即是记事之篇，实无“记言”之科。《书经》选自历代档案文献，记言记事俱有，故孔子、庄子都说“《书》以道事”，并无《书》以记言之说。儒家以为《书》记先王前言往行，可以从中吸取历史经验教训，获得仁行义方的启示。《尚书大传》说：六篇誓辞可以观义，五篇诰文可以观仁，《甫（吕）刑》可以观刑，《洪范》可以观法，《禹贡》可以观九州之事，《皋陶谟》可以观政治之术，《尧典》可以观尧舜美德。儒家主张从寻常处看到不寻常，从一般中看到不一般。以今天的眼光看，《尚书》的文章，自《盘庚》以下多出实录，以前则多是故老相传的口碑资料。佚《家语》载：漆雕开“习《尚书》，不乐仕”（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《索隐》引），知孔子在世时《书》学已有专门人才。至秦焚书，儒者藏书壁中。汉兴，济南伏生发取其书，亡数十篇，得29篇，以汉隶写录，是为“今文《尚书》”。汉代立于学官的欧阳、大小夏侯之学皆是今文。景武之际，又得孔子壁中古文《尚书》，孔子的后人孔安国以今文校之，多得16篇，是为“古文《尚书》”。古文《尚书》藏之秘府，后来民间稍有传授，但终不甚显。至东晋时期，梅颐献58篇本的《古文尚书》，并有传注，说是孔安国所作。风行于南北朝，唐修《正义》，亦用该《书》。后来，南宋吴棫、朱熹对后出古文《尚书》以文字浅显提出怀疑；明人梅鹗作了进一步论证，至清阎若璩、惠栋而成定说。

《十三经注疏》本，即沿用梅颐所献《古文尚书》，其中包括与今文29篇相同的33篇；即《尧典》、《舜典》（今文合于《尧典》）、《皋陶谟》、《益稷》（今文合于《皋陶谟》）、《禹贡》、《甘誓》、《汤

誓》、《盘庚》（上、中、下）、《高宗彤日》、《西伯戡黎》、《微子》、《牧誓》、《洪范》、《金縢》、《大诰》、《康诰》、《酒诰》、《梓材》、《召诰》、《洛诰》、《多士》、《无逸》、《君奭》、《多方》、《立政》、《顾命》、《康王之诰》（今文合于《顾命》）、《吕刑》、《文侯之命》、《费誓》、《秦誓》。

今文所无 25 篇：即《大禹谟》、《五子之歌》、《胤征》、《仲虺之诰》、《汤诰》、《伊训》、《太甲》（上、中、下）、《咸有一德》、《说命》（上、中、下）、《秦誓》（上、中、下）、《武成》、《旅獒》、《微子之命》、《蔡仲之命》、《周官》、《君陈》、《毕命》、《君牙》、《冏命》。

宋、明、清代学者一般认为，梅氏所献多出的 25 篇，是梅氏伪造（有人说是王肃伪造），58 篇传注亦是梅氏所撰。不过清人还承认，伪《书》文字多系缀拾古书所引佚《书》的零篇断简而成，还具有一定史料价值。只要知其来源，校以原文，仍可引据。清人阎若璩《古文尚书疏证》、惠栋《古文尚书考》和孙星衍《尚书今古文注疏》发覆伪《古文尚书》根柢甚详，是清代辨伪的代表作。不过，孔颖达《尚书正义·尧典篇》引十八家《晋书》，列举了古文《尚书》自西晋郑冲、苏愉、梁柳、臧曹，到梅赜（即梅颐）的传授世次，还指出皇甫谧从“姑子外弟梁柳边（处）得古文《尚书》，故作《帝王世纪》往往载孔传五十八篇之书。”前儒错误地否定了古文《尚书》这一传授记载，已经陈梦家、蒋善国、李学勤等先生考定证实。根据《帝王世纪》辑本，皇甫谧当时已引及《五子（之）歌》、《伊训》、《汤诰》、《仲虺之诰》、《君牙》、《冏命》（即《冏命》）。还征引孔安国传两处。此外，仲长统还引述过《周官》，应劭引《秦誓》，徐干引《蔡仲之命》，郑玄引《伊训》、《周官》，郭璞亦引孔传等等。前贤已多有指出。可见 58 篇古文《尚书》，在梅颐之前（甚至早在东汉后期）即已流行，广为学人征